

# 对中国城市化与服务业 发展双重滞后的一个解释

——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视角

张松林 李清彬 武 鹏\*

**摘要:** 与传统文献把城市化滞后与服务业发展滞后分开解释不同,本文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将二者联系起来。研究得出,中国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双重滞后的根源在于交易效率长期处于低水平演进状态。长期低水平演进的交易效率导致“分工刚性”,使得整个经济体长期停滞于低水平的分工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亦工亦农”的农民工难以向“全职非农”(完全分工)的市民转变;与此同时,制造业企业自我提供服务,限制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然而,农民工促进城市工业的分工以及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分工使得工业化顺利进行。因此,这种分工结构一直存在意味着长期只存在工业化,而无农民工市民化和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从而导致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的“双重滞后”。

**关键词:** 城市化 服务业 工业化

##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都滞后于工业化,文贯中(2009)称之为“双重滞后”。众多文献对中国城市化滞后进行了解释,如 Kirkby(1985)、耿海青(2003)、顾乃华(2005)、范建刚(2005)、王海涛和程萧红(2006)、Chang和 Josef(2006)、蔡军(2006)。也有不少文献对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进行了解释,如王述英(1992)、许宪春(2000)、杨伟民(2004)、高传胜等(2008)。但是还没有文献把两者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解释。实质上,高帆(2005)研究得出,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这表明工业化、服务业发展和城市化三者可以统一在社会分工的理论框架下进行阐释。依据这一思路,我们猜想:中国城市化滞后与服务业发展滞后可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并且,两者极有可能可以在社会分工的理论框架下得到合理解释。有鉴于此,为了填补学术界这一空白,本文试图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建立一个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进而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对中国的这种“双重滞后”现象进行新的解释。

与以往文献对城市化滞后与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孤立解释不同,我们试图探索导致这两种经济现象产生的共同原因,这将更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双重滞后”的本质,并在化解这种滞后局面时真正做到对症下药,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 二、基本模型

经济学家们早就意识到社会分工与城市出现之间的内在关系(Smith, 1776; Marshall, 1890),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经济学家(Yang, 1991; Yang and Rice, 1994; Fujita and Krugman, 1995)更进一步地建立了能够解释城市如何从社会分工中出现的一般均衡城市化模型,其中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城市化模型

\* 张松林,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300071,电子信箱:wxn300@yahoo.cn;李清彬,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300071;武鹏,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300071。

最为突出。<sup>1</sup> 本文的建模思路以新兴古典城市化模型为基础, 这里主要参考的是 Yang (1991) 的城市化模型。Yang 模型旨在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建立一个一般均衡城市化模型, 本文虽然借助该模型的基本框架, 但重点在于解释中国“双重滞后”这一经济现象。

结合研究目的的需要, 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1) 每个经济主体都以生产者 - 消费者的角色出现。作为生产者, 其可以在  $x$  和  $y$  两种产品以及服务  $r$  之间做出选择; 作为消费者, 其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需要同时消费两种产品和服务。这里,  $x$  是农产品, 具有土地密集型的属性, 即生产时需要较多土地要素, 所以生产  $x$  的经济主体必须分散居住在面积广大的空间上;  $y$  是工业品, 生产时只需较少的土地要素; 服务  $r$  的提供亦只需较少的土地要素。因此, 生产  $y$  和提供服务  $r$  的经济主体既可以分散居住在一片面积广阔的空间, 也可以集中居住。本文将选择生产  $y$  和提供服务  $r$  而不生产  $x$  的经济主体称为  $G$  类人, 而将选择生产  $x$  (不管是否选择生产  $y$  或提供服务  $r$ ) 的经济主体称为  $N$  类人。(2) 经济主体购买一单位商品或服务的交易成本系数为  $1 - k$ , 即交易效率为  $k$ ,  $k \in [0, 1]$ 。(3) 令一对  $G$  类人之间的交易效率为  $k = n$ , 一个  $G$  类人和一个  $N$  类人之间的交易效率为  $k = s$ , 一对  $N$  类人之间的交易效率为  $k = m$ , 则可得不等式  $n > s > m$ <sup>④</sup>。

基于以上假定, 每个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可以表示为:

$$\text{Max} u = [x + k(r + kr^d)x^d][y + k(r + kr^d)y^d] \tag{1}$$

$$\text{s.t. } x^p = x + x^s = L_x^a \tag{2}$$

$$y^p = y + y^s = L_y^a \tag{3}$$

$$r^p = r + r^s = L_r^a \tag{4}$$

$$L_x + L_y + L_r = 1 \tag{5}$$

$$p_x(x^s - x^d) + p_y(y^s - y^d) + p_r(r^s - r^d) = 0 \tag{6}$$

以上模型中的所有变量均为非负数。方程 (1) 是一个特殊的柯布 - 道格拉斯效用函数, 其中,  $u$  表示单个经济主体的效用;  $x, y, r$  分别表示两种产品及服务的自给量,  $x^d, y^d, r^d$  分别表示两种产品及服务的购买量。为了简便而不失一般性, 这里假定产品  $x$  和  $y$  对效用  $u$  的贡献度都相同, 即对于所有经济主体而言, 其偏好都是相同的。约束条件中的第一个方程是  $x$  产品的生产函数, 这里,  $x$  和  $x^s$  分别表示  $x$  产品的自给量和售卖量;  $L_x$  表示生产  $x$  时的劳动投入;  $a$  表示个人专业化程度指数 (此时  $a > 1$ , 即生产系统显示出专业化经济)。同样, 约束条件中的第二个方程和第三个方程分别表示产品  $y$  的生产函数和服务  $r$  的生产函数。约束条件中的第四个方程和第五个方程分别表示资源约束和预算约束, 其中, 前者表示投入在产品和服务上的资源总量恒为 1; 后者表示市场出清,  $p_i (i = x, y, r)$  分别表示产品或服务的价格。

### 三、交易效率决定分工结构均衡的机理分析

文定理: 最优决策为任何人从不同时买和卖同种产品, 从不同时买和生产同种产品, 每个人最多卖一种产品。<sup>(四)</sup>

根据上述文定理, 本文就以下三种社会分工结构展开讨论。

#### (一) 结构 A: 自给自足

每个经济主体生产并消费两种产品  $x$  和  $y$ 。由于不存在产品交易, 就没有必要提供服务  $r$ 。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可以表示为:

$$\begin{aligned} \text{Max} u_A &= xy \\ \text{s.t. } x^p &= x = L_x^a \\ y^p &= y = L_y^a \\ L_x + L_y &= 1 \end{aligned} \tag{7}$$

模型中,  $x, y, L_x, L_y$  是决策变量。解上述最优化问题, 可得以下均衡解:  $x = y = \left(\frac{1}{2}\right)^{\frac{1}{a}}; L_x = L_y = \frac{1}{2}$ ,  $u_A = \left(\frac{1}{2}\right)^{\frac{2}{a}}$ 。

<sup>1</sup> 在城市化研究中, 杨小凯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古典经济学中的城市化理论进行模型化, 即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 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中城市化理论的高潮。正是基于此,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城市化方面的研究成果被称为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关于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详细内容可参考杨小凯 2003 年版的《发展经济学》, 这里不再赘述。

<sup>④</sup> 见杨小凯, 2003《发展经济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 271 页。  
<sup>(四)</sup> 文定理的具体证明过程见杨小凯, 2003《发展经济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 66- 67 页。

## (二) 结构 B: 部分分工

每个经济主体自给产品  $x$  和产品  $y$  以及服务  $r$  的任意两种, 从而购买其余一种产品或服务。部分分工状态下, 经济主体之间存在以下三种组合:

1 组合  $B_1$ :  $xr/y$  和  $yr/x$ 。前者表示生产  $x$ , 提供  $r$ , 售卖  $x$  而购买  $y$  的一类人; 后者表示生产  $y$ , 提供  $r$ , 售卖  $y$  而购买  $x$  的一类人。

对于  $xr/y$  而言, 其决策行为可以表示为:

$$\begin{aligned} \text{Max}_{B_1} &= sxry^d \\ \text{s.t. } &x^p = x + x^s = L_x^a \\ &r^p = r = L_r^a \\ &L_x + L_r = 1 \\ &p_x x^s = p_y y^d \end{aligned} \quad (8)$$

模型中,  $p_x$  和  $p_y$  是价格参数。解上述最优化问题, 可得以下均衡解:  $L_x = \frac{2}{3}$ ,  $L_r = \frac{1}{3}$ ,  $x = x^s = \frac{1}{2} \left( \frac{2}{3} \right)^a$ ;  $y^d = \frac{1}{2} \left( \frac{2}{3} \right)^a \frac{p_x}{p_y}$ ,  $r = \left( \frac{1}{3} \right)^a$ ;  $u_{B_1} = \left( \frac{1}{2} \right)^2 \left( \frac{1}{3} \right)^a \left( \frac{2}{3} \right)^{2a} s \frac{p_x}{p_y}$ 。

同理, 对于  $yr/x$  而言, 应用相同的方法可求得其均衡解为:  $L_y = \frac{2}{3}$ ,  $L_r = \frac{1}{3}$ ,  $y = y^s = \frac{1}{2} \left( \frac{2}{3} \right)^a$ ;  $x^d = \frac{1}{2} \left( \frac{2}{3} \right)^a \frac{p_y}{p_x}$ ,  $u_{B_2} = \left( \frac{1}{2} \right)^2 \left( \frac{1}{3} \right)^a \left( \frac{2}{3} \right)^{2a} s \frac{p_y}{p_x}$ 。利用效用均等条件, 可分别求得各商品价格之比和该组合的均衡效用:  $p_x : p_y = 1 : 1$ ;  $u_{B_2} = \left( \frac{1}{2} \right)^2 \left( \frac{1}{3} \right)^a \left( \frac{2}{3} \right)^{2a} s$ 。

2 组合  $B_2$ :  $xy/r$  和  $xr/y$ 。前者表示生产  $x, y$ , 售卖  $x$  而购买  $r$  的一类人; 后者表示生产  $x$ , 提供  $r$ , 售卖  $x$  而购买  $y$  的一类人。据此可知, 处于模式  $xy/r$  的一类人不会和处于模式  $xr/y$  的一类人进行交易, 因为处于模式  $xr/y$  中的一类人不能在市场中买到  $y$ 。因此, 组合  $B_2$  不会存在。

3 组合  $B_3$ :  $xy/r$  和  $yr/x$ 。前者表示生产  $x, y$ , 售卖  $x$  而购买  $r$  的一类人; 后者表示生产  $y, r$ , 售卖  $y$  而购买  $x$  的一类人。据此可知, 处于模式  $xy/r$  的一类人不会和处于模式  $yr/x$  的一类人进行交易, 因为处于模式  $xy/r$  中的一类人不能在市场中买到  $r$ 。因此, 组合  $B_3$  不会存在。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 组合  $B_1$  是结构 B 的局部均衡。此时均衡效用为:  $u_B = \left( \frac{1}{2} \right)^2 \left( \frac{1}{3} \right)^a \left( \frac{2}{3} \right)^{2a} s$ 。

## (三) 结构 C: 完全分工

完全分工结构下存在三类经济主体: 一是  $x/r$ , 只生产并出售  $x$  而购买  $y$  和  $r$ ; 二是  $y/xr$ , 只生产并出售  $y$  而购买  $x$  和  $r$ ; 三是  $r/xy$ , 只提供并出售  $r$  而购买  $x$  和  $y$ 。完全分工状态下, 经济主体之间只存在一种组合, 即  $x/r, y/xr$  和  $r/xy$ 。

对于  $x/r$  而言, 其决策行为可以表达为:

$$\begin{aligned} \text{Max}_{C_1} &= xsr^d y^d \\ \text{s.t. } &x^p = x + x^s = L_x^a \\ &L_x = 1 \\ &p_x x^s = p_y y^d + p_r r^d \end{aligned} \quad (9)$$

解上述最优化问题, 可得以下均衡效用:  $u_{C_1} = \left( \frac{1}{3} \right)^3 s^2 \frac{p_x^2}{p_y p_r}$ 。同理, 可分别求得  $y/xr$  和  $r/xy$  的均衡效用:

$u_{C_2} = \left( \frac{1}{3} \right)^3 s^2 \frac{p_y^2}{p_x p_r}$ ;  $u_{C_3} = \left( \frac{1}{2} \right)^6 s n \frac{p_r^2}{p_x p_y}$ 。利用效用均等条件, 可分别求得各产品价格之比和该组合的均衡效用:  $p_x : p_y : p_r = \frac{n^{\frac{1}{3}}}{s^{\frac{1}{3}}} : 1 : \frac{4}{3}$ ,  $u_C = \left( \frac{1}{2} \right)^6 \left( \frac{4}{3} \right)^2 s^{\frac{4}{3}} n^{\frac{2}{3}}$ 。据此, 可以求出这三种模式中各个决策变量:

(1) 对于  $x/r$ ,  $L_x = 1$ ;  $x = \frac{1}{3}$ ,  $x^s = \frac{2}{3}$ ,  $y^d = \frac{1}{3} n^{\frac{1}{3}} s^{-\frac{1}{3}}$ ;  $r^d = 4 n^{\frac{1}{3}} s^{-\frac{1}{3}}$ 。

(2) 对于  $y/xr$ ,  $L_y = 1$ ;  $y = \frac{1}{3}$ ,  $y^s = \frac{2}{3}$ ,  $x^d = \frac{1}{3} n^{-\frac{1}{3}} s^{\frac{1}{3}}$ ;  $r^d = \frac{1}{4}$ 。

(3) 对于  $r/xy$ ,  $L_r = 1$ ;  $r = \frac{1}{2}$ ,  $r^s = \frac{1}{2}$ ,  $x^d = \frac{1}{3} n^{-\frac{1}{3}} s^{\frac{1}{3}}$ ,  $y^d = \frac{1}{3}$ 。

由于完全分工结构下, 经济主体之间只有一种组合, 所以此时均衡效用即为:  $u_C = \left(\frac{1}{2}\right)^6 \left(\frac{4}{3}\right)^2 s^{\frac{4}{3}} n^{\frac{2}{3}}$ 。

综合上述分析, 当  $u_A > u_B$  和  $u_A > u_C$  时, 一般均衡是结构 A; 当  $u_B > u_A$  和  $u_B > u_C$  时, 一般均衡是结构 B; 当  $u_C > u_A$  和  $u_C > u_B$  时, 一般均衡是结构 C。据此, 本文可得以下角点均衡, 如表 1 所示。其中,  $s_1 = 4 \cdot 3^{\frac{2}{3}}$

$$\left(\frac{3}{4}\right)^{\frac{2}{3}}; n_1 = 2^6 \left(\frac{3}{4}\right)^3 \left(\frac{2}{3}\right)^{\frac{3}{2}} \left(\frac{1}{3}\right)^{\frac{3}{2}} s^{\frac{-1}{2}}; n_2 = 2^{9-3n} \left(\frac{3}{4}\right)^3 s^{-2}。$$

表 1	角点均衡
s和 n的取值范围	均衡结构
$0 < m < s < s_1 \leq n < n_2$	A
$s_1 < s < n < n_1$	B
$\text{Max}\{n_1, n_2\} < n < 1$	C

#### 四、“双重滞后”的成因及其化解机制

在结构 A 中, 由于每个经济主体都生产农产品, 而农产品是土地密集型产品, 所以他们会分散居住。此时就不会出现城市, 即没有城市化进程。同时, 每个生产者自我提供工业品和服务, 所以工业品和服务都没出现分工深化, 即没有工业化进程, 服务业也没有发展起来。结构 A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封建时代“你耕田来我织布”的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经济。

在结构 B 中, 有两类人  $xr/y$  和  $yr/x$ , 前者为生产农产品  $x$  和提供服务  $r$  并出售  $x$  而购买工业品  $y$  的一类人; 后者为生产工业品  $y$  和提供服务  $r$  并出售  $y$  而购买农产品  $x$  的一类人。因此,  $xr/y$  一类人不再生产工业品  $y$ , 而让  $yr/x$  一类人去生产, 这说明工业品出现了分工深化, 即出现工业化进程。此时,  $yr/x$  一类人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交易效率会选择靠近  $xr/y$  一类人, 这就是农村工业化发展的情形<sup>1</sup>, 这种情况下不会出现城市化。同时, 这两类人都要从事服务的生产, 所以此时服务仍然没有出现分工深化, 即服务业没有发展起来。

在结构 C 中, 有三类人, 一是  $x/r$  只生产并出售农产品  $x$  而购买工业品  $y$  和服务  $r$  的一类人; 二是  $y/xr$  只生产并出售工业品  $y$  而购买农产品  $x$  和服务  $r$  的一类人; 三是  $r/xy$  只提供并出售服务  $r$  而购买农产品  $x$  和工业品  $y$  的一类人。与组合 B 相比, 工业品的生产进一步分工深化, 此时出现了专门生产工业品  $y$  的一类人  $y/xr$ , 这种工业品的分工深化意味着工业化。同时, 由于工业品和服务不具有土地密集型的属性, 所以处于模式  $y/xr$  和  $r/xy$  的两类人为了获取较高的交易效率  $n$ , 会选择集聚在某地而不是分散, 这种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也即城市化进程。并且,  $x/r$  和  $y/xr$  两类人不再提供服务, 而让  $r/xy$  一类人专门去提供, 表明服务出现了分工深化, 也即服务业发展起来了。

上述分析如表 2 随着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 一般均衡结构会由 A 演进到 B 再到 C。当交易效率很低时, 一般均衡结构为 A, 此时既无工业化也无城市化, 服务业也没发展起来; 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进而达到一定临界值时, 一般均衡结构则为 B, 此时出现了工业化, 但不存在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 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进而达到一定临界值时, 一般均衡结构则为 C, 此时既存在工业化也存在城市化, 服务业也得以发展起来。

表 2	三种均衡结构中工业化、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情况		
一般均衡结构	是否存在工业化	是否存在城市化	是否存在服务业发展
A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B	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C	存在	存在	存在

总结上文, 我们用图 1 来表述“双重滞后”的成因及其化解逻辑。当一般均衡结构演进到结构 B 时, 如果交易效率持续处于低水平演进状态, 那么均衡分工结构将总是无法进一步演进到更高水平的分工结构 C, 从而导致“分工刚性”。这样的话, 均衡分工结构就会停滞在结构 B, 此时将只存在工业化, 而不存在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若这种分工结构一直维持下去, 则意味着长期中只有工业化, 而无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 最终必将导致出现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只有当交易效率正常演进, 从而达到一定临界值时, 结构 B 才会演进到结构 C, 此时不但存在工业化, 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也会得以顺利进行。由此可见, “双重滞后”是由于交易效率长期处于低水平演进状态, 造成“分工刚性”所致。只有实现交易效率的健康演

<sup>1</sup> 高帆 (2005) 的研究也得出了这一结论。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59

进,进而最终促进均衡分工结构向更高分工结构演进,才能化解“双重滞后”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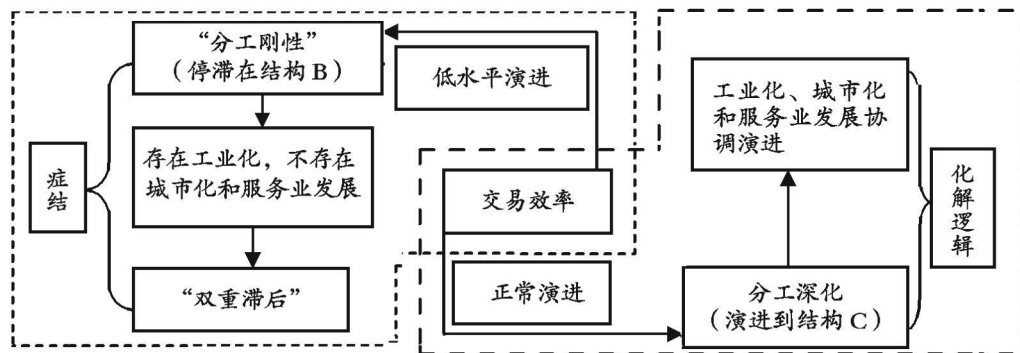


图 1 “双重滞后”的成因及其化解逻辑

## 五、中国“双重滞后”形成的内在机理

由前文的分析可知,“双重滞后”的根源是交易效率持续处于低水平演进状态。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来解析中国“双重滞后”形成的内在机理。

张松林(2009)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农民工相关的制度和政策作为事实证据证实了“迁移型交易效率”的低水平演进,并研究得出,持续处于低水平演进状态的“迁移型交易效率”使得“亦工亦农”的农民工长期以来难以向“全职非农”的市民转变。显然,“亦工亦农”的农民工就是一种部分分工的经济主体,他们并没有完全从农产品生产中分工出来成为“全职非农”的市民。<sup>1</sup>如果部分分工状态一直存在,即“亦工亦农”(部分分工)的农民工长期不能向“全职非农”(完全分工)的市民转变,那么城市化进程必将受到制约。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着大量的农民工,期间的“民工潮”更是人类史上出现的规模最大的劳动力流动。目前,中国仍有1.2亿多“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再加上“离土不离乡”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全国共有2亿多农民工,规模甚至大于正式的城市工人群众(张国胜,2009)。

高帆(2007)把交易效率界定为“经济体在特定时期内,交易参与方在开展交易活动时的投入-产出关系”。在此基础上,他从市场供求的低水平均衡、政府职能的错位行使或行使不力以及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三个方面证明了中国经济体的交易效率确实处于低水平演进状态。具体地,他通过构造一套指标体系测度出了2001年80个国家的综合交易效率指数,其中中国2001年的综合交易效率指数仅为0.8879,不仅远低于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马来西亚、泰国、乌拉圭等发展中国家(高帆,2007)。正是由于较低的交易效率导致了较高的单位交易成本,工业部门不会从外部购买自己所需的各种服务,而是采用自我提供的方式,即将服务内部化。据第五次中国物流市场供需状况调查报告(2006)显示,中国49%的生产制造企业拥有自己的汽车车队、48%拥有机械化的装卸设施、46%拥有自己的仓库、13%拥有铁路专用线、9%拥有高架库或立体库。同样根据该报告,中国生产制造企业中原材料物流由第三方承担的仅为19%,产成品物流由第三方承担的仅为18%。这种情况实际上对应的就是模型中部分分工结构B的情形,即服务业分工不足,专业化发展无法实现。<sup>④</sup>

然而,上述情况并不会对工业化进程造成很大障碍。一方面,部分分工的农民工虽不能市民化,但从农

<sup>1</sup> 本文认为“亦工亦农”的农民工是部分分工的经济主体,主要是指他们难以从农产品生产中彻底分离出来。如果他们转变为“全职非农”的市民,说明他们已从农产品生产中彻底分离出来,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分工演进。在现实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农民工大多集中于脏、累、险、重、苦、差的非正规部门,工作大多是具有临时性的非正式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农民工不会放弃农业,如他们会农忙时回家农闲时进城、身体不好时回家身体好时进城、不好找工作时回家好找工作时进城等等,且最终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还是会回到农村。李明桥等(2009)将这种现象称为“钟摆现象”。总之,农民工没有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如果要使“亦工亦农”的农民工向“全职非农”的市民转变,那么他们在城市必须要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此时不用也不可能兼顾农业),并可以享受城市里的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等。但是目前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各种城乡分割的制度使得农民工向市民转变的单位交易成本太高(交易效率太低),从而限制了农民工分工水平的提高(即“亦工亦农”难以向“全职非农”转变)。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把农民工大致分成以下几类:A.在附近城镇临时打工经商(兼顾务农);B.不进城而到乡镇企业就业(兼顾务农);C.城郊农民到邻近城市打工经商(兼顾务农);D.常年在外地或附近打工经商(不再兼顾务农)。部分分工可以解释A、B、C,但是对“全职非农”的D解释力不够,而按中国目前的做法,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D类农民工已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因此,本文所指的处于部分分工状态的农民工主要是指A、B、C三类。感谢匿名审稿人建议作者对农民工的进一步思考!

<sup>④</sup>高传胜等(2008)的研究也发现,中国服务业内部化现象严重,而外部化、专业化发展不足。

民向农民工的转变可以促进工业化,这是因为他们的到来使得城市的分工体系较之以前更为高级。例如现实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本地市民基本在正规部门工作,而农民工大多进入非正规部门(张松林,2009)。钟笑寒(2006)通过实证研究也得出,农民工确实与当地“职工”从事着不同的职业:前者主要从事非熟练工作(如“蓝领”工作),而后者则主要从事熟练工作(如“白领”工作)。事实上,农民工为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尊重。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测算,农民工对中国GDP的贡献在3万亿元以上,全国总工会在广东的调查就显示,农民工对广东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达25%(何雄浪、李国平,2007)。另一方面,部分分工的制造业企业可以向市场提供工业品,表明制造业企业之间形成了较为有效的分工,这无疑会促进工业化进程。<sup>1</sup>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用图2来表述中国“双重滞后”形成的内在机理。由于交易效率长期处于低水平演进状态,低水平的分工结构无法向高水平的分工结构演进,从而导致中国整个经济体的“分工刚性”,即整个经济体长期停滞在部分分工结构。一方面,部分分工的农民工不得不处于“亦工亦农”状态,难以向“全职非农”的市民转变;另一方面,部分分工的制造业企业不得不自我提供服务,导致“服务内部化”,从而限制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然而,农民工促进城市工业分工以及制造业企业之间进行分工却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化进程。这种结构的持续存在意味着长期中只存在工业化,却无农民工市民化以及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因而导致城市化滞后和服务业发展滞后,亦即“双重滞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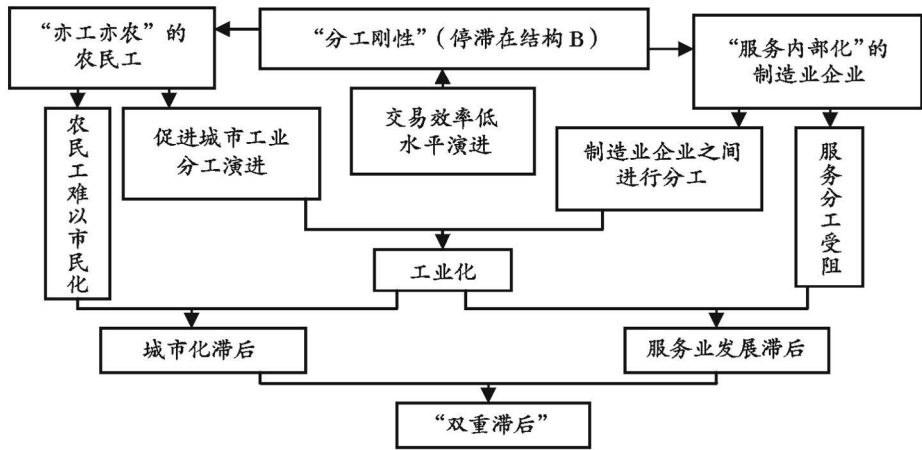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双重滞后”形成的内在机理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中国既存在城市化滞后的反常现象,又存在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不利局面,亦即“双重滞后”。目前,学术界对城市化滞后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对服务业发展滞后进行了精辟的解释,但未能将两者放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解释。为此,本文通过建立一个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解释了中国的“双重滞后”现象。研究得出,中国“双重滞后”的根源在于交易效率长期处于低水平演进状态。具体而言,长期处于低水平演进状态的交易效率导致了“分工刚性”,即整个经济体长期停滞在部分分工结构。在部分分工结构中,“亦工亦农”的农民工难以向“全职非农”(完全分工)的市民转变;制造业企业自我提供服务,形成“服务内部化”的局面,从而限制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然而,农民工促进城市工业的分工以及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分工使得工业化得以顺利进行。这种分工结构能够持续就意味着中国长期存在工业化,却无农民工市民化以及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从而导致城市化滞后和服务业发展滞后。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化解中国“双重滞后”的政策含义是非常明显的,即不断提高中国整个经济体的交易效率,促进经济主体分工水平的高级化。交易效率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即在技术操作层面影响交易效率的因素;二是制度层面,即在制度形成层面影响交易效率的因素(高帆,2007)。因此,具体的政策措施应该从这两个层面来展开。在技术层面上,一是在加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更加强调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力争实现城乡公共基础设施的衔接,最大限度降低城乡之间的交通成本和信

<sup>1</sup> 需要指出的是,在某种情况下,制造业企业内部的分工也会促进工业化,如一个产品各个生产环节之间的分工,但本文模型并没考虑这种分工形态,而是以产品之间的分工来展开,所以本文提到的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分工特指产品之间的分工。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提醒!

息成本;二是拓展信息发布渠道,联通农民工与用工单位,降低两者之间的匹配成本;三是加大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促进交通运输及信息等领域的技术进步,提高城乡间和区域间交通一体化和信息化水平。在制度层面上,一是改变“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模式,进一步改革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就业制度、教育与培训制度、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真正打破城乡之间的人为分割,促进城乡分割走向城乡融合,从而提高城乡间交易效率;二是消除地方政府的各种维护地方保护的制度和政策,降低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交易成本;三是进一步加大对国有服务企业改革,破除服务行业垄断,特别是高级服务业垄断,改善市场环境和完善市场制度,推进市场化进程。

#### 参考文献:

1. 蔡军, 2006《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化因素分析》,《城市规划》第1期。
2. 范建刚, 2005《推进非农产业城市化: 加快我国城市化的内在要求》,《科学·经济·社会》第4期。
3. 高帆, 2005《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经济研究》第9期。
4. 高帆, 2007《交易效率、分工演进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上海三联书店。
5. 高帆, 2007《交易效率的测度及其跨国比较: 一个指标体系》,《财贸经济》第5期。
6. 高传胜、汪德华、李善同, 2008《经济服务化的世界趋势与中国悖论: 基于WDI数据的现代实证研究》,《财贸经济》第3期。
7. 耿海青, 2003《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的原因分析及未来展望》,《地理科学进展》第1期。
8. 顾乃华, 2005《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内在机制探析》,《岭南学刊》第2期。
9. 何雄浪、李国平, 2007《专业化产业集聚、空间成本与区域工业化》,《经济学(季刊)》第4期。
10. 李明桥、傅十和、王厚俊, 2009《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钟摆现象”的解释》,《人口研究》第1期。
11. 马歇尔, 2005《经济学原理》,中译本,华夏出版社。
12. 王海涛、程萧红, 2006《我国城市化滞后原因探析》,《江西测绘》第3期。
13. 王述英, 1992《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性浅析》,《南开经济研究》第5期。
14. 文贵中, 2009《文贵中: 中国“双重滞后”的制度障碍》,人民网: <http://sh.people.com.cn/GB/134952/154142/154152/9279839.html> 5月11日。
15. 许宪春, 2000《90年代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分析》,《管理世界》第6期。
16. 杨伟民, 2004《我国服务业滞后的原因》,《经济研究参考》第15期。
17. 杨小凯, 2003《发展经济学》,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8. 张松林, 2009《中国城市化滞后成因及其化解: 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九届中国经济学会入选论文。
19. 张国胜, 2009《基于社会成本考虑的农民工市民化: 一个转轨中发展大国的视角与政策选择》,《中国软科学》第4期。
20. 钟笑寒, 2006《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21. 赵红军, 2005《交易效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 一个城市经济学分析框架及其在中国的应用》,上海人民出版社。
22. Fujita M., and P. Krugman. 1995. “When is the Economy Monocentric: Von Thunen and Chamberlin Unified.”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5(4): 505–528.
23. Chang, G. H., and C. B. Josef. 2006. “The Paradox of China’s Growing Under-urbanization.” *Economic Systems* 30(1): 24–40.
24. Kirkby, R. J. R. 1985 *Urbanis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2000AD*. London: Croom Helm.
25. Smith, Adam.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6. Yang X. 1990. “Development Structure Change and Urbaniz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34(1–2): 199–222.
27. Yang X., and R. Rice. 1994. “An Equilibrium Model Endogenizing the Emergence of a Dual Structure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Sector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35(2): 346–368.

## An Explanation for Double Lag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Servi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Zhang Songlin, Li Qingbin and Wu Peng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a’s “double lag” on urbanization and service’s development is interpreted under a unifi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this paper,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s. It finds that transaction efficiency in a low evolution level in a long period is the root of China’s “double lag”. The long-term low-level evolution of transaction efficiency results in “rigid division of labor”, which is a long-term stagnation in a part division structure. In this structure, it is difficult for peasant workers to become into citizens and also th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of self-provision of services would limit the specialization level. However, both the urban-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promot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easants to peasant worker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make rapid progress on industrialization. This state is always existent, which means the process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neither brings peasant workers becoming citizen, nor the specialization of the service in the long term, and thus ultimately results in “double lag”.

**Key Words** Urbanization Service Industrializ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R00 L80 N60

(责任编辑: 孙永平、陈永清)